

牟宗三学术论著集·讲座系列

中国哲学 的特质

牟宗三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牟宗三学术论著集·讲座系列



牟宗三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牟宗三学术论著集·讲座系列

中国哲学的特质

牟宗三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4.25 插页 4 字数 89,000

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6,000

ISBN 7-5325-2292-X

B·279 定价: 7.70 元

出版前言

牟宗三先生(1909~1995),字离中,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。1909年6月12日(宣统元年四月二十五日)出生于山东栖霞牟家疃。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。先后任教于山东寿张县乡村师范、广州学海书院、山东邹平村治学院、广西梧州中学、南宁中学、华西大学、中央大学、金陵大学、浙江大学,并主编《再生》、创办《历史与文化》、编辑《理想历史文化》杂志;1949年后,历任台湾师范大学、东海大学、香港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教授,新亚研究所哲学组导师,受聘讲学于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、台湾师大国文研究所、中兴大学等校,后任东海大学、中国文化大学、中央大学荣誉讲座教授,讲授逻辑、知识论、西方哲学、中国哲学与文化。1995年4月12日,逝于台北。

牟宗三先生以“反省中国文化生命,以重开中国哲学之途径”为一生职志。初从张申府先生习罗素、维特根斯坦、怀特海哲学,后长期追随当代新儒学开山熊十力先生,与唐君毅、徐复观同为熊氏在港台的三大弟子。熊氏曾说:“宗三出自北大,北大自有哲系以来,唯此一人为可造。”牟先生一生讲学不倦,著述不已,传世的著述译作三十种。其中有:哲学讲座《中

国哲学的特质》(1963年6月初版,以下仅注明初版年月,省“初版”二字)、《中国哲学十九讲》(1983年10月)、《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》(1990年3月),以及牟先生去世后刊行的《人文讲习录》(1996年2月)(还有尚未刊行的《四因说演讲录》),由此可统窥牟先生学问的范围、大纲节目、脉络指向、文化意愿及精神意态。《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》(1935年5月)、《历史哲学》(1955年夏)、《名家与荀子》(1979年3月)、《才性与玄理》(1963年9月)、《佛性与般若》(1977年6月)、《心体与性体》(三大册,1968年5月、10月,1969年6月)、《从陆象山到刘蕺山》(1979年8月),为一整套的中国哲学史论。其中《历史哲学》又与《道德的理想主义》(1959年11月)、《政道与治道》(1961年2月)并称为三新外王学(历史社会政治哲学)名著。译注康德哲学的三大批判:《康德的道德哲学》(1982年9月)、《康德纯理性之批判》(上下册,1983年3月、7月)、《康德判断力之批判》(上下册,1992年10月、1993年2月)。《逻辑典范》(1941年9月)、《理则学》(1955年11月)、《认识心之批判》(1956年9月),以及译注维特根斯坦《名理论》(1987年8月),乃为其逻辑学、认识论著作。《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》(1974年3月)、《现象与物自身》(1974年8月)、《圆善论》(1985年8月),则表示牟学思想体系的完成。此外还有《生命的学问》(1970年9月)、《五十自述》(1989年1月)、《时代与感受》(1984年3月)等。

牟宗三哲学是中国传统儒学乃至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发展,“第三期儒学”的概念即首先由牟先生所提出。牟先生是当代新儒学主要的、影响卓著的代表人物。他的先后期门生弟子大多是港、台地区哲学界、新生代的杰出学者,影响遍及

北美、英、欧陆、日、韩、新、澳洲等地。《中国哲学的特质》和《中国哲学十九讲》七八十年代已有韩文版行世；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Joël Thoraval 博士现正拟将前书译成法文印行。1987 年香港大学特颁牟先生荣誉文学博士仪式上，哲学系教授 F. C. Moore 博士特致辞说牟先生由儒家的心性学为起点所建立的“道德形上学”，为一超越义的形上学系统提供一道德的证明，是一勇敢而有原创性的思想线索，有深远的成果。同年冬季学期起，德国波昂大学专设“牟宗三哲学”课程，由哲学系教授 J. Simon 博士与汉学系教授 R. Traunzettel 博士共同主讲。《简明大英百科全书》也设“牟宗三”条目。牟先生生前名字又进入 1995 年出版的《英文剑桥哲学字典》索引，其中“中国哲学”的总条目中指出“牟先生是当代新儒一派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”。

为满足学术界的需求，提供一种学术资料，经上海社科院罗义俊先生积极联系推荐，征得牟宗三先生夫人赵惠元女士的同意并全权授权，由本社印行牟先生部分著作的简体字本，并同意个别地方稍作技术性处理。此外，由印刷故，原书个别的错讹字，径改而不标明标校之符号；《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》则依牟先生生前所作的标校，亦径改。本社现在的印行次第，并没有遵循牟先生著作原来发刊的时序，是经过相应策划后的编排。至于书末所附由罗义俊研究员撰写的读书笔记，作为一家之言，仅供读者参考。

《中国哲学的特质》再版自序

此小册便于初学，但因是简述，又因顺记录文略加修改而成，故不能期其严格与精密。倘有不尽、不谛或疏阔处，尤其关于《论》、《孟》与《中庸》、《易传》之关系处倘有此病，则请以《心体与性体》之《综论》部为准，以求谛当，勿以此而生误解也。

此讲辞以儒家为主，盖以其为主流故也。若通过《才性与玄理》、《心体与性体》、《佛性与般若》，再加以综括之简述，则当更能尽《中国哲学之特质》一题名之实，而凡所述者亦当更能较精当而切要。惟如此之简述，内容虽可较丰富，然与西方哲学相对较以显特质，即使不加上道家与佛教，亦无本质的影响也。故此小册题名曰《中国哲学之特质》，纵使内容只限于儒家，亦无过。

牟宗三 序于香港

一九七四年八月

小 序

本讲演是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所规定的题目。约定十二次讲完，每次一小时。在这十二次里，想把中国哲学的特质介绍给社会上公余之暇的好学之士，当然是不很容易的。如果是轻松地泛泛地讲述，那当然比较具体一点，听起来也比较有兴趣。但这样恐怕不会有真正的了解，也不是这个倒塌的时代讲中国学问之所宜。因此，我采取了直接就中国学问本身来讲述的办法。这也许听起来比较艰难一点，但若因此而稍能把握一点中国学问之内在的本质，或即不能把握，而在艰难之感中，引起对于中国学问之正视与敬意，这也并非无益处。

中国哲学包含很广。大体说来，是以儒释道三教为中心。但我这里是以中国土生的主流——儒家思想，为讲述的对象，其余皆无暇涉及。

本讲演并无底稿。在讲述时，托王煜同学笔录。口讲与自己撰文不同，而笔录与讲述之间亦不能说无距离。如果我正式撰文，也许比较严整而详尽。但有这个时间限制的机会，也可以逼迫我作一个疏略而扼要的陈述，这也自有其好处。而王君的记录也自有其笔致。换一枝笔来表达，也自

有其新鲜处。顺其笔致而加以修改,也觉得与我的原意并不太差。紧严有紧严的好处,疏朗有疏朗的好处,是在读者藉此深造而自得之。

目 录

出版前言	1
《中国哲学的特质》再版自序	1
小 序	1
第 一 讲 引论: 中国有没有哲学?	1
第 二 讲 中国哲学的重点何以落在主体性与道德性?	9
第 三 讲 忧患意识中之敬、敬德、明德与天命	15
第 四 讲 天命下贯而为“性”	20
第 五 讲 孔子的仁与“性与天道”	26
第 六 讲 由仁、智、圣遥契性、天之双重意义	33
第 七 讲 主观性原则与客观性原则	42
第 八 讲 对于“性”之规定	
(一)《易传》、《中庸》一路	54
第 九 讲 对于“性”之规定	
(二)孟子一路	62
第 十 讲 复性的工夫	71
第十一讲 中国哲学的未来	82
第十二讲 作为宗教的儒教	93

附录:

儒学与儒教

——读牟宗三先生《中国哲学的特质》……罗义俊 107

第一讲

引论：中国有没有哲学

中西哲学，由于民族气质、地理环境与社会形态的不同，自始即已采取不同的方向。经过后来各自的发展，显然亦各有其不同的胜场。但是中国本无“哲学”一词，“哲学”一词源自希腊，这是大家所熟知的。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通名使用。若把这源自希腊的“哲学”一名和西方哲学的内容合在一起，把它们同一化，你可以说中国根本没有哲学。这个时代本是西方文化当令的时代，人们皆一切以西方为标准。这不但西方人自视是如此，民国以来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说来，亦无不如此，所以有全盘西化之说。中国以往没有产生出科学，也没有开出民主政治，这是不待言的。说宗教，以基督教为准，中国的儒释道根本没有地位。说哲学，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哲学，所以人们也就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哲学。这样看来，中国文化当真是一无所有了。构成一个文化的重要成分、基本成分，中国皆无有，哪里还能说文化？其实何尝不是如此？说中国

以往没有开发出科学与民主政治,那是事实。说宗教与哲学等一起皆没有,那根本是霸道与无知。人不可以如此势利。这里当该有个分别。西方人无分别,还可说。中国人自己也无分别,那就太无出息了。

五四前后,讲中国思想的,看中了墨子,想在墨子里翻筋斗,其他皆不能讲。既无兴趣,也无了解。原来中国学术思想中,合乎西方哲学系统的微乎其微,当时人心目中认为只有墨子较为接近美国的实验主义。实则墨学的真精神,彼等亦不能了了,彼等又大讲《墨辩》,盖因此篇实含有一点粗浅的物理学的知识,又含有一点名学与知识论。虽然这些理论都极为粗浅,而又语焉不详,不甚可解,但在先秦诸子思想中,单单这些已经足够吸引那些浅尝西方科学哲学的中国学者。因此,研究墨子,其实是《墨辩》,一时蔚为风气。钻研于单词碎义之中,校正训诂,转相比附。实则从这里并发现不出真正科学的精神与逻辑的规模。而那些钻研的人对于逻辑与西方哲学,也并无所知,连入门都不可得,更不用说登堂入室了。舍本逐末,以求附会其所浅尝的那点西方哲学,而于中国学术之主流,则反茫然不解。

后来冯友兰写了一部《中国哲学史》,彼在《自序》里自诩其中之主要观点是正统派的。可是冯书之观点实在不足以言正统派。冯书附有陈寅恪和金岳霖二先生的审查报告。其中陈氏多赞美之语,如说冯书“能矫附会之恶习,而具了解之同情”。此实亦只貌似如此,何尝真是如此?陈氏是史学家,对于中国思想根本未曾深入,其观冯书自不能有中肯之判断。至于金岳霖先生,他是我国第一个比较能精通西方逻辑的学者,对于西方哲学知识论的训练也并不十分外行。他看出冯书

“讨论《易经》比较辞简，而讨论惠施与公孙龙比较的辞长。对于其他的思想，或者依个人的意见，遂致无形地发生长短轻重的情形亦未可知”。金氏虽知冯氏之思想倾向于西方的新实在论，但是力言冯氏并未以实在主义的观点批评中国思想。这虽在冯书第一篇容或如此，但在第二篇就不见得如此。冯氏以新实在论的思想解析朱子，当然是错的。以此成见为准，于述及别的思想，如陆、王，字里行间当然完全不相干，而且时露贬辞。这即表示其对于宋明儒者的问题根本不能入，对于佛学尤其外行，此皆为金氏所不及知。金氏早声明他对于中国哲学是外行。我们自不怪他。

同时冯书另一致命缺点，那就是分期的问题。冯书分二篇。首篇名为《子学时代》，自孔子以前直至秦汉之际，类似西方古希腊时代。次篇名为《经学时代》，由汉初至清末民初之廖季平，这又类似西方的中世纪。但并无近代。冯氏以西方哲学之分期方式套在中国哲学上，显为大谬。至于冯书特别提出并且注重名学，对《墨辩》、《荀子·正名篇》，以及惠施、公孙龙等的名学所作的疏解，当然并非无价值。而且对中国名学之特别重视，仿佛提供了研究中国哲学一条可寻的线索。可惜先秦的名学只是昙花一现，日后并未发展成严整的逻辑与科学方法。所以名学不是中国哲学的重点，当然不可从此来了解中国之传统思想。故冯氏不但未曾探得骊珠，而且其言十九与中国传统学术不相应。

中国学术思想既鲜与西方相合，自不能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定取舍。若以逻辑与知识论的观点看中国哲学，那么中国哲学根本没有这些，至少可以说贫乏极了。若以此断定中国没有哲学，那是自己太狭隘。中国有没有哲学，这问题甚易

澄清。什么是哲学?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,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,便是哲学。中国有数千年的文化史,当然有悠长的人性活动与创造,亦有理智及观念的反省说明,岂可说没有哲学?任何一个文化体系,都有它的哲学,否则,它便不成其为文化体系。因此,如果承认中国的文化体系,自然也承认了中国的哲学。问题是在东西哲学具有不同的方向和形态。说中国没有“希腊传统”的哲学,没有某种内容形态的哲学,是可以的。说中国没有哲学,便是荒唐了。西方的哲学工作者,历来均有无视东方哲学的恶习,所以他们的作品虽以哲学史为名,而其中竟无只字提及东方的哲学。如此更易引起一般人的误会,以为东方哲学无甚可观,甚至以为东方全无哲学。哲学就等于西方哲学,哲学尽于西方。二次大战前后,罗素始一改西方哲学史作者的传统态度,名其书为《西方哲学史》。本“不知盖阙”的态度,不讲东方,但无形中已承认了东方哲学的存在。罗素又著《西方之智慧》(Wisdom of the West),不名为人类之智慧,特标“西方”二字,亦可见他对东方并未忽视。时至今日,东西方都应互相尊重平视,藉以调整、充实、并滋润其文化生命,否则无以克魔难。西方人若仍固步自封,妄自尊大,那也只是迷恋其殖民主义恶习之反映。中国人少数不肖之徒,若再抵死糟蹋自己,不自爱重,那只可说是其买办之奴性已成,自甘卑贱,这只是中国之败类。

中国既然确有哲学,那么它的形态与特质怎样?用一句最具概括性的话来说,就是中国哲学特重“主体性”(Subjectivity)与“内在道德性”(Inner-morality)。中国思想的三大主流,即儒释道三教,都重主体性,然而只有儒家思想这主流中的主流,把主体性复加以特殊的规定,而成为“内在

道德性”，即成为道德的主体性。西方哲学刚刚相反，不重主体性，而重客体性，它大体是以“知识”为中心而展开的。它有很好的逻辑，有反省知识的知识论，有客观的、分解的本体论与宇宙论；它有很好的逻辑思辨与工巧的架构。但是它没有好的人生哲学。西方人对于人生的灵感来自文学、艺术、音乐，最后是宗教。但是他们的哲学却很少就文学、艺术、音乐而说话。他们的哲学史中并没有一章讲耶稣。宗教是宗教，并不是哲学。宗教中有神学，神学虽与哲学有关，而毕竟仍是神学，而不是哲学的重点与中点。哲学涉及之，是哲学的立场，不是宗教的立场。他们有一个独立的哲学传统，与科学有关，而独立于科学；与宗教、神学有关，而独立于宗教、神学。而且大体还是环绕科学中心而展开，中点与重点都落在“知识”处，并未落在宗教处，即并不真能环绕宗教中心而展开。但是中国哲学却必开始于儒道两家。中国哲学史中，必把孔子列为其中之一章。孔子自不像耶稣式的那种宗教家，亦不类西方哲学中的那种哲学家。你如果说他是苏格拉底，那当然不对。印度哲学中亦必须把释迦牟尼佛列为一章。释迦亦不类耶稣那种宗教家，亦不像西方哲学中那种哲学家。但是孔子与释迦，甚至再加上老子，却都又有高度的人生智慧，给人类决定了一个终极的人生方向，而且将永远决定着，他们都取得了耶稣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之地位。但他们都不像耶教那样的宗教，亦都不只是宗教。学问亦从他们的教训，他们所开的人生方向那里开出。观念的说明，理智的活动，高度的清明圆融的玄思，亦从他们那里开出。如果这种观念的说明，理智的活动，所展开的系统，我们也叫它是哲学，那么，这种哲学是与孔子、释迦所开的“教”合一的：成圣成佛的实践与成圣

成佛的学问是合一的。这就是中国式或东方式的哲学。

它没有西方式的以知识为中心,以理智游戏为一特征的独立哲学,也没有西方式的以神为中心的启示宗教。它是以“生命”为中心,由此展开他们的教训、智慧、学问与修行。这是独立的一套,很难吞没消解于西方式的独立哲学中,亦很难吞没消解于西方式的独立宗教中。但是它有一种智慧,它可以消融西方式的宗教而不见其有碍,它亦可以消融西方式的哲学而不见其有碍。西方哲学固是起自对于知识与自然之解释与反省,但解释与反省的活动岂必限于一定形态与题材耶?哲学岂必为某一形态与题材所独占耶?能活动于知识与自然,岂必不可活动于“生命”耶?以客观思辨理解的方式去活动固是一形态,然岂不可在当下自我超拔的实践方式,现在存在主义所说的“存在的”方式下去活动?活动于知识与自然,是不关乎人生的。纯以客观思辨理解的方式去活动,也是不关乎人生的,即存在主义所说的不关心的“非存在的”。以当下自我超拔的实践方式,“存在的”方式,活动于“生命”,是真切于人生的。而依孔子与释迦的教训,去活动于生命,都是充其极而至大无外的,因此,都是以生命为中心而可通宗教境界的。但是他们把耶教以神为中心的,却消融于这以“生命”为中心而内外通透了。既能收,亦能放。若必放出去以神为中心,则亦莫逆于心,相视而笑,而不以为碍也。众生根器不一,何能局限于某一定型而必自是而非他?

中国哲学以“生命”为中心。儒道两家是中国所固有的。后来加上佛教,亦还是如此。儒释道三教是讲中国哲学所必须首先注意与了解的。二千多年来的发展,中国文化生命的最高层心灵,都是集中在这里表现。对于这方面没有兴趣,便